

語文教學

第二輯

浙江台州師專中文科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 录

1980、12 第二期

教材分析与研究

感天动地三誓愿.....冉 明 (1)

关于《指南录后序》.....应家淦 (4)

漫卷诗书喜欲狂.....孙 山 (10)

《公输》的论辩艺术.....周福云 (15)

关于《活版》.....余瑛祺 (18)

《社戏》的艺术手法.....汤作铭 (22)

白描、对比、幽默

——《老杨同志》艺术琐谈.....竺柏岳 (26)

一条线索、三组对比

——《我的叔叔于勒》的结构.....屠爱伦 (31)

再谈“天姥”.....林 军 (34)

鲁 迅 作 品 讨 论

对“祥林嫂反抗性格”的异议.....陈志信 (36)

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语言瑕疵拾零.....万远量 (41)

关于鲁迅《自嘲》诗“千夫指”的新旧解.....早 页 (45)

教 学 笔 谈

要潜移默化,要生动活泼.....陈恭怀 (48)

“板书”札记.....苏 版 (51)

板书:应引人注目.....孙 阳 (53)

板书六例.....徐志诚、徐亦兵(56)

作文教学

文风小议.....张光昌(60)

改进写作指导的一点尝试.....江口中学语文组(61)

扬善抑恶、经渭分明.....裘惠民(66)

作文教学琐记.....张绍军(69)

(1) 语言探讨

中学文言文中通假字、异体字注释的体例问题...高洪胜(70)

初中四册古文几条注释之我见.....朱汉杰(74)

《狱中杂记》一句话的注释和标点.....尚 风(77)

文言语气词“也”可以表示时间.....龚泽华(79)

“所字结构”、“者字结构”与“的字结构”.....

.....谢丹月 一 丁(80)

量词“对、双、副”小孔.....朱文献(85)

汉语教学拾零(三则).....柯梧野(88)

也谈究竟是用“的”还是用“地”.....何 磊(90)

名篇欣赏

读《凤凰涅槃》.....许善铭(93)

语文知识

古代地理名词举要.....枣一丁(98)

补白(二则).....一 丁

感天地三誓愿

冉 明

《窦娥冤》是我国古典戏剧中的大悲剧，它的第三折《法场》（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写窦娥临刑前极度怨愤惨痛的心情，表现她至死不屈的反抗精神。从情节上看，这一折是全剧的高潮，以窦娥埋怨天地混淆是非开始，以窦娥对天盟誓和三个誓愿——应验作结束。对于这一折里窦娥“怨天”、“祈天”，以及“天从人愿”这些情节，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里想谈谈个人的浅见。

古时候的人相信天地，以为天地是公正无私的。每当吃苦受难悲痛已极而又无处申诉的时候，就会呼天号地，幻想得到救助。司马迁就说过这样的话：“夫天地者人之始也，……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窦娥生活在高利贷残酷剥削、官府昏庸、恶霸地痞横行的社会里。她从小“少爷无娘”，做了童养媳。后来又死了丈夫，除了一个年老的婆婆之外，别无依靠。她年纪轻轻就备尝了当时社会给予她的种种悲苦惨痛。最后她以清白无辜之身，横遭诬害，惨死于非法之下，蒙受了千古奇冤。窦娥短短的一生，负屈衔冤，孤苦无告，因此她不断地向天哭诉、呼告、甚至失望以致抱怨。如她一出场就对天倾诉：“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接着因受了张驴儿的诬陷，挨了县官毒打，她愤然向天控诉：“天那，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这时她仍相信“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直到第三折，她被绑赴法场，面临“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这一惨

酷的情景时，她的一切侥幸都幻灭了，对于天地的信仰也被残酷的现实轰毁了。此时此景，她“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她义愤填膺，指责天地不分清浊，错勘贤愚。虽然这样，窦娥还是不甘心枉死，不屈服于恶势力的。她要洗雪自己的冤屈，她要抗议“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的暴政。但是在当时这个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凭谁来洗雪，向谁去抗议呢？孤苦伶仃的窦娥确实是有冤无处诉的。然而她的无比深重的冤屈所激起的强烈的反抗精神并没有被扼杀，鸣冤、抗争，这是当时她最急切的要求。在这欲诉无门的绝境中，她又一次燃起了对天的希望——在当时除这样做之外，窦冤实在是别无办法的。为了证明“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于是她接连对天发了三个不寻常的誓愿。

根据上面这些情节，我们可以看出写窦娥多次呼天叫地，并非作者随便的笔墨，而是经过精心安排的。窦娥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无依无靠的妇女，她内心充满了愁苦而又无处诉说，所以她比别人更多地想得到天的垂怜和援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者写窦娥对天的态度又是有变化的，是根据窦娥的性格和情节的发展写她对天的不同态度的。窦娥对天先是希望，再是埋怨，最后又是希望。这个过程，特别是两个转折是符合在当时条件下窦娥的心里变化的。从希望到埋怨，是在窦娥蒙冤上法场的时候；从埋怨到盟誓，则是在立刻就要“刀过处头落”的瞬息之间。窦娥对天的埋怨和否定，反映了她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她的“三誓”则进一步显现出她坚强不屈的性格。窦娥最后的发誓也不同于她起初的“信天”。她在提出三个誓愿时唱道：“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绵”。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充满了感天动地的正气和信心。在这里与其说是信天，不如说更多的是自信。这种磅礴的气概

是窦娥坚定自信的体现，是她不屈精神的升华。由此可见“三誓”应看成是窦娥性格发展的一个环节，它和第三折开头的“怨天”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它们是前后连贯的。

信天是虚妄的，但在古代这种现象是普遍的。关汉卿反映了这种现实，并且把窦娥的信天、怨天、祈天和当时的环境及窦娥随环境而变化的心理紧密结合起来写，所以显得真实可信。这种深刻生动、曲尽人物内心变化的描写，是作者对当时的社会和对窦娥这个悲剧人物的性格作了深入发掘的结果，也是关汉卿善于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表现。

那末又该怎样看待“天从人愿”这个问题呢？

天感人意，因而应验了“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亢旱”这三个誓愿，这种怪事当然是不可能有的。即使是窦娥引为先例的“苌弘化碧”、“望帝啼鹃”、“六月飞霜”、“东海孝妇”等等也不过是体现人民愿望的神话罢了。那末关汉卿为什么偏要创造出这种神奇的情节来呢？我们如果从整本《窦娥冤》的剧情来看，不难发现这是情节发展的必然趋势。上面已经谈到提出三愿是合于窦娥心里发展的。现在窦娥既然提出了用以证明她死得冤枉的三愿，那么在《窦娥冤》全剧中，明显表现出对当时社会作深刻揭露批判，对窦娥给予无限同情的关汉卿，根据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由此产生的爱憎感情，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创造出这一富于戏剧性的情节，来证明窦娥死的委实冤枉，她的生命是被当时残暴的社会吞噬了的。这样安排剧情，也是自然的。如有水到渠成，是势所使然的。我们再从反面来看，假令天不显灵，三个誓愿不应验，那么就达不到窦娥要让世上人知道她是枉死的目的，也显不出她满腔怨愤所爆发出来的感天动地的力量来。可见“天从人愿”既是情节发展的结果，又是窦娥反抗

关于《指南录后序》

杭州红星中学 应家淦

《指南录》是文天祥自编的一部诗集，他将南宋末年悲痛的亲身经历，以诗的形式汇编成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个人愿望，处处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诗集之所以名为《指南录》，是因为渡扬子江诗中云：“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各首诗前都有小序，这篇《后序》则是全集之序，以别于他两个月前写的《自序》。

赵宋王朝自赵构南渡，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后，先对女真族，继而对蒙古族屈膝求和，苟安于半壁江山。到宋恭帝德祐元年（一二七五年）叛将吕文焕引元兵攻破鄂州。渡江东下，京城空虚，始“诏天下勤王”，向各地讨求兵，但此时南

精神的进一步描写。我们还可以从读者或观众的心理来看这个问题，会觉得这一情节是从观众的要求出发来写的，其艺术效果也是好的。因为窦娥受的迫害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观众肯定会同情她，希望她的冤案得到昭雪。人民平时对这类屈打成招、草菅人命的冤狱敢怒而不敢言。现在借上苍显灵这一情节，对窦娥和广大人民的反抗精神给予有力的支持，使正义得以伸张，黑暗政治受到严厉抨击，当然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它引起观众对窦娥的同情，并激起人们对黑暗势力的愤怒。七百年来我国戏曲舞台上不断演出《窦娥冤》，有时并且直接以《六月雪》命名。由此可以看出观众对于这些情节的评价了。

宋已是岌岌可危了。

文天祥于宋理宗宝祐元年（一二五七年）少年登科，举进士第一后，直至一二七五年二月，方被任命为江西安抚副使，知赣州。当勤王诏到赣州后，文天祥“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山蛮”，聚集了万余人。他“尽以家资为军费”，举起勤王义旗，“入卫”京城。八月，文天祥到临安，上疏建议“分境内为四镇”，凭借“地大人众”，抗击元兵。但这建议竟被当权者认为“迂阔”，不屑一顾。

十一月，元兵分三路进军，元“右丞相”伯颜率中军入常州，与另二路约期会师临安。当时临安城内有勤王兵三、四万人，加上原有驻军，本可支撑一时。文天祥与张世杰等主张“与敌血战”，但丞相陈宜中效法秦桧、贾似道，对敌妥协，多次派员往见伯颜，一再请求投降，均遭伯颜拒绝。

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伯颜军自长安镇进驻皋亭山，会合左、右二路军，“游骑至临安府北阙。”文天祥、张世杰请求移三宫（谢太后、全太后和宋恭帝）入海，由他们“帅众背城一战，”陈宜中不仅不许，反而派监察御史杨应奎捧上传国玺前往乞降。伯颜受了降表，派人叫陈宜中去商议投降事宜，陈宜中为了逃避责任，继续独揽朝政，竟在当天夜晚带了恭帝两个小兄弟——益王昀和广王昀——“遁归温州之清澳”。

十九日，文天祥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此时的临安城内人心惶惶，谣传伯颜将要屠城。文天祥受众人所托，以国难当头，“不得爱身”的气概，挺身而出，“辞相印而不拜”，前往元营，见伯颜于明因寺。他以强硬的态度，宣称元军必须全部退兵，才是上策，否则，宋朝淮、浙、闽、广的广大人民将奋起抗战，元军“兵连祸结，必自此始”。由于文天祥慷慨陈辞，伯颜就放回其余使者，单把文天

祥扣住不放，派“万户”忙兀台、“宣抚”唆都监视他。

二月初一日，宋恭帝与文武百官“望元阙上表，乞为藩辅”，正式投降。恭帝派贾余庆、吴坚等充“祈请使”到元营，伯颜特地将文天祥带来与贾、吴等同坐。坐间，文天祥面斥贾余庆等卖国，责备伯颜扣人失信。这时叛将吕文焕之侄吕师孟还厚着脸皮“慰解”文天祥，文天祥义正辞严地痛斥他们叔侄“合族为逆”，是万世的贼臣。

事后，伯颜强迫文天祥随同“祈请使”北上。到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后，文天祥“得间”逃往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县）。本想借真州安抚使苗再成的力量，约齐淮东淮西两制置使（李庭芝、夏贵）“连兵大举”再图中兴。但李庭芝怀疑他投降元军，命苗再成杀他。好在苗再成不忍，将他放了，得以逃出一命。这样，他只得从杨子江入海，“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其景况之凄惨，奋斗之艰危，真可谓“辛苦遭逢”，均见于《后序》文中。

二

《指南录后序》是为介绍诗集的背景、内容和写作目的而写的。全文记叙了南宋朝廷在战乱来临时的狼狈情况，概括了作者在国难当头时的真实思想和艰险遭遇，表现了他虽处于九死一生之中，仍坚持战斗的顽强意志和牺牲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震撼人心的激情，不可作一般序文读。

选入教材的共有六个段落，可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以至于永嘉”）按时间、地点和人事的次序，写出文天祥出使元军，被驱北往到逃亡流徙，直至冒极大的危险到达永嘉。本部分又可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第一自然段）写元军大兵压境，南宋京城危急

和文天祥出使元军。

正月十八日，元军游骑已到临安北关，文天祥被挂上了“右丞相兼枢密使”的空头衔。在这“立有鱼肉之忧”，兵临城下之际，那些达官贵人聚集于左丞相吴坚府中，而“莫知计所出”。投降派的活动已公开化，南来北往的使者车辆络绎不绝。作者描写当时南宋朝廷的狼狈处境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元军要南宋主持国事的人去议定条款，根本无人敢去，而文天祥却抱着救国的目的，毅然前往。在这国难当头之日，放着丞相不做，偏偏要去敌营，其目的在于察看元军内情，以便“归而求救国之策”。这一段文字，充分表现了文天祥以国事为重、以己身为轻，不惜牺牲个人而奋力救国的品质。

第二层：（第二自然段）写文天祥达到元营后，慷慨陈辞，被伯颜无理扣留，不久被胁迫北往。

文天祥起勤王兵，本想要用武力抗元，但由于局势变化，仓卒之间难以抵抗，只得在外交方面作斗争。出使元营时，虽敌强我弱，而决不示弱于敌、有辱于国家。所以，他一会见伯颜时，处处保持尊严，慷慨激昂地声明来元营谈判是为了商议撤兵的办法，决非为投降。指出如若元方不答应，那么宋朝尚有广阔土地，举国齐心抗战，胜负尚未可知。文天祥的说辞，引起元方“上下颇惊动”，“未敢遽轻吾国”，在外交上是获得了重大胜利的。此时外有文天祥作斗争，若内又同时准备防御，未尝没有一线生机。无奈赵宋统治者力主屈膝，“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眉于后”，这就必然陷文天祥于孤立之境，不但救国无望，反陷文天祥于囹圄。后来，当文天祥感到“国事”已不可收拾时，更不顾自身的利害，“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豁出命来干，顽强斗争到底。任凭伯颜派忙兀台、唆都威胁利诱，总不动摇。这一段前面部分的叙

述，充分显示出文天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精神，以至连伯颜都曾伸出舌头说“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唆都曾说：“文丞相骂得吕家好”。

元军在占领临安后，除追迫南宋朝廷下令各地投降外，又将贾余庆等“祈请使”驱往大都（北京市）请降。文天祥此时也被胁迫北上，只是並不将他列于“使者之目”，而将他作俘虏看待的。本段后面部分，除记叙此事外，还写出了文天祥之所以“隐忍北行”，还是被“中兴”所鼓舞，希望此行“将以有为也”。

第三层：（第三自然段）写文天祥中途脱逃，历尽艰险，直至永嘉的经过。

文天祥被胁迫北上至京口“得间”脱逃到真州。可惜李庭芝中了敌人的反间计，怀疑文天祥投降了元军，命苗再成杀他。虽经苗再成释放，但文天祥遭此厄运，内心的苦衷，不容置辩。只得忍辱逃亡，出没于兵荒马乱的长、淮间。凡别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他都忍受下来，终于克服重重困难，辛苦辗转达到二王所在地——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

这种长期的艰苦磨难，成了考验他的极好机会，是以锻炼他成为真正的民族英雄。在这段叙述中，作者饱经艰险，而“中兴”无望，顿觉有“天高地迥、号呼靡及”的悲叹。行文至此，激动万分，按捺不住感情，紧接着转入下文。

第二部分：（自“呜呼”起到“痛何如哉”）以艰苦奋斗、脱离各次险境为中心，列举了多次达到死亡边缘的情景，感情溢于言表，读来怵目惊心。

文天祥自出使元军，被驱北行，奔波于真、扬子间，逃亡于长淮之时，莫不有死的可能。但他终于逃出元军，而免于死。尤其是不力辩于真、扬二守将对他的怀疑，含诟忍辱，相信总

有一天会真相大白。这表明他始终以宋将的职守为重，以个人的毁誉为轻，不惜牺牲个人，顾全大局，以利于国家。至于他长途展转，“及于死者，不知其几”，则更是置死生于度外，随时准备牺牲了。从文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死生的态度决不苟且、决不感情用事，而是有所为的。表现出他坚决、勇敢、刚正的性格，非匹夫之勇可比。“人自生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他后来终于聚兵福建、经略江西、进屯广东，直至被俘孑然一身，成仁取义，为国为民作了最大的牺牲。

第三部分：（从“予在患难中”到结束）说明在患难之中，自编《指南录》诗集和作序的用意和时间。

文天祥不是普通的诗人，他的《指南录》，确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及个人为国为民的艰苦奋斗史，代表着民族的“正气”和时代的呼声。“时穿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作者在患难中写的诗篇，既是历史的见证，又是“昭示后人”的好教材，所以“不忍废”而将其编纂成集，以“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可谓“苦心孤诣”。诗集定名《指南录》，更可见作者眷念祖国、向往“中兴”的一片忠诚。

三

文天祥奉使诣北，逃亡流徙直至回到温州，其间展转奋斗，艰苦之情状，在《指南录》的各首诗中，均已一一表达，作为诗集的序文，就只须将这些经历扼要叙述。所以《后序》全文的重点放在分析当时形势，讲明自己的思想上。为此，凡关系国家安危者就详加叙述；凡牵涉个人品德者就从略，显得剪裁得体，详略得当。如他奉命出使元营，虽然只一、二天时间，但把事前的局势，出使的打算和慷慨陈辞的情状作交代；而本人在元营虽被扣留二十余日，而受监视、遭痛苦的情况一字不写，只

漫卷诗书喜欲狂

——简析《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孙 山

李唐王朝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荣，到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代，趋于顶盛之状，然已孕育着衰败之兆，终于在天宝十四载（公元77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在战乱中，杜甫辞官离京，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寄寓成都。不久，成都少尹徐知道又叛乱，逼使杜甫从成都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就在此时此地，杜甫忽然听到官军收复被安禄山、史思明所占据的河南河北的胜利喜讯，他仿佛从满目疮痍中看

用“予不得归矣”一笔带过。真、扬二州是军事重镇，文天祥原对此寄予极大的“中兴”希望的，所以在叙述时，把前后经过、打算都叙得较为详细；而跋涉于长淮间，奔波于海路上，因属于个人的艰苦，就将其限于很短的篇幅内。

本文虽是一篇序文，却是记叙、议论与抒情结合的优秀散文。作者在记叙的基础上，对敌我双方形势、国家前途都作了精辟的分析，又将真挚的忧国忧民的感情，坦白的胸怀寓于叙议之中。特别在写了第三自然段的艰苦情状之后，感情自然流露，抑止不住，故用叹息语调领起第四段文字。以“及于死者，不知其几”总括，下文连用十八个“死”字，具体而生活地概括了“九死一生”的事实，抒发了极其复杂而激动的感情，读来令人同情，振人心弦。

到河山光复的一线景象，真是喜不自禁，过去的慷慨悲歌为目前的欢欣纵歌所代替。因此，欣然命笔，写了这首著名的抒情诗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这首诗热情洋溢，奔腾喧嚣，不仅从诗的形象中奔突着喜悦的感情，而且从诗的节奏里飞转着明快的旋律。现在，还是让我们共同进入诗的境界，领略这种诗情，享受这种旋律吧！

“剑外忽传收蓟北”——起笔不凡，平中见奇。“剑外”，不仅点明听到胜利捷报的地点，而且说明自己颠沛流离的处境。

“忽传”一“忽”字，表明捷报飞来之突然、快速，喜出望外之情，于此透出。可谓奇峰突起。“收蓟北”笔锋一收，点明所闻之事件。它似为叙述句式，然而却是全诗感情狂涛之缘起。果然如此，“初闻涕泪满衣裳”——“初闻”，一语双关，既是紧承首句之“忽传”，又是紧扣题旨之“闻”字。所谓“初闻”者，即一开始就听到了之谓也。一听到，就流泪，可见诗人感时忧国之急切心情溢于言表了。所以，“涕泪满衣裳”是穷写“初闻”之后，那种由痛定思痛、悲喜交加的复杂心情所迸发出来的热烈感情。这是此篇诗歌感情的爆发点。别林斯基说得好：“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我们不妨说，诗人就是强烈感情的化身。不过这个感情呢，《文心雕龙·情采》说得妙：

“为情者要约而真。”杜甫的这首抒情诗就是约而真的。试设想，如果仅仅停留于什么“涕泪满衣裳”，感情纵然激越，然而难免有“为文而造情”之嫌了。可贵的是“为情而造文”。请再看颌联诗情，便知此说并非虚妄。

“却看妻子愁何在”——“却”字，系副词，作“再”解，冠之于动词“看”之前，具有状态作用。你看，自己热泪夺眶而出，再去看看患难与共的妻子儿女，又是如何呢？妻子儿女当然也是兴高采烈的，但诗人却不用“喜”字，而偏用“愁何在”

的反跌法。这又是一语双关，既描绘了眼前的“不愁”，而又刻划了以前的“忧愁”，更以昨日之“愁”反衬今日之“喜”，含意深邃，诗味浓郁。你看嘛，连妻子儿女都为了“收蓟北”而转愁为乐了，那么诗人自己呢，“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先看杜甫在四川的好友严武的《寄题杜拾遗锦江野亭》诗：“漫向江头把钓竿”句中的“漫向”，意谓毫无拘束地到江边把竿垂钓。那此处的“漫卷”之“漫”亦含有此层意思，却又似乎进了一层，那就是兴冲冲地抛掉诗书，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乐极忘形，是“喜欲狂”形象的具体化。狂者，感情放荡不羁之谓也。“喜欲狂”，在特定人物的特定场合中，其表现形态必然是“漫卷诗书”。可贵的是，同是写愉快情态，由于人物身份不同，性格相异，写法不同，用词有别。这样，人物的个性化就栩栩如生了。如果说“愁何在”是从侧面写妻儿独特的喜悦方式——以欢慰而递衬自己的喜悦，那么“喜欲狂”则是从正面写自己独特的喜悦方式——以狂欢而映衬妻儿的愉悦。一家大小对平乱捷报的不同情态的精工细雕，岂不跃然纸上？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了！

“白日放歌须纵酒”——一般地说，“放歌纵酒”是李白诗风的特点。但是作为现实主义的诗人杜甫，今朝也在“放歌纵酒”了。你说奇也不奇？但见怪不怪，这“放歌须纵酒”既是前句“漫卷诗书”的逻辑发展，又是“喜欲狂”的形象写照。狂喜到何种程度呢？到了既“放”且“纵”的地步。它又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一家老小开怀痛饮几杯，放声高唱几曲嘛！“青春作伴好还乡”——是承颌联首句的，由“愁何在”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青春”一词，如果依照《语文》课本的注释，仅作为“明媚的春光”解，似乎偏而狭了些，与意境不符。“青春”，实指当然是“明媚的春光”，但似宜还应看到虚拟

的一面，就是借景抒情：诗人想到合家于离乱之后，作伴返回故乡，“妻子愁何在”呢？没有了，有的是满腔喜欢，满面春风；儿子当是青春妙龄，自不待言；老伴呢，在“喜欲狂”的诗人眼中，岂不也年轻了十来岁了吗？这样，天然的春光景色与人为的感情春色，岂不在“青春”一词中浑然一体了吗？啊，生活是美的，特别是经过战乱颠波之后的和平生活，安定团结，那更是美不胜收了。本联前句是诗人的狂态写照，后句则是诗人的狂想抒发，感情深化，至此升华到白热化程度，简直是莫可名状了。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颈联所谱的一部“还乡”狂想曲，在这尾联凑出了最高音。十四字，一气读。情愈挚，调愈昂。身在梓州，心飞洛阳。“即从”、“便下”似乎尚嫌不足以表达那种归心如箭的心情，于是又特地加了“穿”与“向”，心情如此奔放，语意这般跳脱。“巴峡”、“巫峡”而至“襄阳”、“洛阳”，均系不同地方之名称，但四地连贯入诗，就构成了“还乡”狂想曲的路线图，具有动态性了。我们也可以随同诗人一起想像，诗人如何乘舟东下，又如何奔赴襄、洛，多么简洁谏达，多么适意明快！全诗至此，虽然戛然而止，然而余音绕耳，令人深思不已。

此诗句式句意简析如上，然其意境的写作特点还应进一步探求：首、颌二联为一段，先写捷报传来之突然，次写“初闻”时悲喜交加的心情，再写妻儿的喜态与自己的狂态。由事到情，由情转态，步步深化，历历分明，诗意隽永。颈、尾二联又为一段，进一步描绘欢喜若狂之形态，但并非停滞不前，而将笔锋一转，由欣喜若狂而趋于联想翩翩，谱出了一支妻儿还乡的狂想曲，于平淡自然中，烛照渴望回乡的急切心情，非大手笔，断难成就矣！

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说得好：“文之英蕤有秀有隐。”这就是说，诗文应该以秀句自然，警策深湛，辞约义丰，含味无穷为上乘。为此，诗人作诗应力求寓警策于秀句中，见秀句于警策中。用现在流行的话则是，倾向性愈隐蔽愈好。诗歌的主题思想宜寓于激情之中，含而不露，放心让读者去揣摩、品味。杜甫的这首七律就是如此的。诗人并非赤裸裸地表白其主题思想，而是选择巧妙之艺术形式，予以表情达意的。为了非常贴切地抒发自己闻捷狂喜之心情，首先选用江阳辙，节奏显得昂扬、亢奋，感情显得激越澎湃。吟诵此诗，犹如长江滚滚，确实颇难自己。其次扣紧一个“喜”字而作文。这“喜”窄看似个人家庭之喜，但细品则是人民渴望平定动乱，企求安定团结局面之喜。反之，则是对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苦难生活之愁。简析至此，其主题思想之归纳就可脱颖而出了：诗人抒发自己忽闻平乱捷报的狂喜情态，深切地表达了自己忧国感时的爱国爱民的真挚感情。这大概不是牵强妄说。因为诗人的主导思想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特别是经历了安史之乱，他在流离失所中，目睹人民苦难生活之深重，热切盼望“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的和平建设的日子的到来。杜甫的这个美好理想，难道不在一千二百年后的今天，降临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了吗？